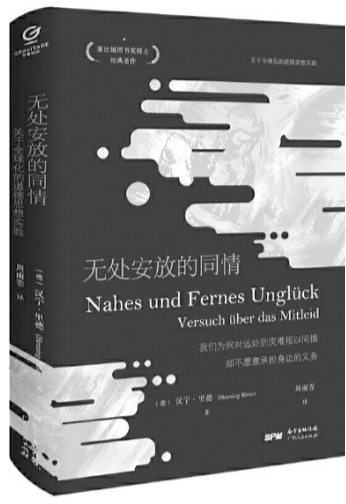


# 道德羽翼的极限

禾刀

**提示** 所有的道德都是有成本的,那些无视成本的道德,往往可疑。《无处安放的同情》通过20余位欧洲哲学家跨越时空的思想交锋,4个著名思想实验,一场关于世界大同的道德辩论,告诉读者这样一个道理:只有直面道德中的利益因子,我们才可能撕掉那些假以道德名义的面具,才可能回到“自然人”的本真位置,才可能在尊重人性基础上,走出一条顺应人性规律的道路。



我们为何对远处的灾难报以同情,却不愿意承担身边的义务?围绕这一道德哲学论题,德国知名作家、莱比锡图书奖得主汉宁·里德在本书中引用了十八世纪以来的“杀死一个‘满大人’”“富有人性的欧洲人”“残暴的思考者”“塞住耳朵的哲学家”等4个著名思想实验,巴尔扎克、卢

梭、伏尔泰、亚当·斯密等启蒙精英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弗洛伊德、荣格等20余位文学与思想巨擘跨越时空,相继登场,展开了一场关于世界大同的思想交锋。

18世纪,继地理大发现后,在商业力量的助推下,人类社会阔步迈向全球化时代。随着人们行动范围的急剧拓展,原有道德观念分化为两种:一种认为适用于身边的人与事,随着空间距离的延伸,道德也会蒸发、变弱。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有卢梭、亚当·斯密等人;另一种认为世界上存在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仁爱道德,经过教育,人的道德羽翼完全可以与遥远的幸福共情。卢梭的“故交”狄德罗、萨德等人是这一论见的忠实拥趸。

## 遥远的“满大人”

若单凭使用意念就可杀死一位远在北京的“满大人”并因此致富,你是否愿意尝试?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抛出了这一经典的哲学寓言。

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哲派并不认为距离会给道德带来多大的障碍,认为只要通过教化,远在欧洲的人们,完全可以与从未谋过面的北京“满大人”产生共情。如果狄德罗的这种普世仁爱道德真的存在,那意味着世界上所有人都具有同样的道德价值取向。当人人有了同样的道德感,战争怎么还会拥有如此肥沃的土壤?

狄德罗的观点在西方社会不乏支持者。“西方文明的子民坚持自己具有设身处地站在他人立场上思考的能力”,但现实是残酷的。十九世纪,英国人贩卖的鸦片曾给北京“满大人”所在的国家带来巨大伤害,然而,当英国人发现鸦片居然出现在伦敦

东区时,他们的第一反应是立即告诫“中国毒品出现在了英帝国的心脏地区”(《鸦片战争》蓝诗玲著)。

亚当·斯密也曾设计了一个相似的寓言:一名与中国毫无贸易往来和利益瓜葛的善良的伦敦人,当他听到这个巨大帝国连同亿万居民被地震吞没时,他首先感到震动,不久后便化为对人生无常的感慨,然后一切回归平常。讽刺的是,如果这名伦敦人在睡前得知自己将失去一根小手指,他会彻夜难眠,惶恐不安。在斯密看来,每个人首先关心的是自己,以及身边的一切。如果一个人的同情心无法与援助受害者的具体行为建立联系,所谓的同情心,就仅仅是一种“矫揉造作的悲情”而已。

建立联系并不容易,尤其对那些与自己毫无利益关联的受害者。这个世界每天都有不幸,人们根本不可能与每个不幸者建立具体的行为联系。斯密将“普世仁爱道德”从高高的坛坛上拉了下来,还原以“自然人”的“自利”本性,继而进一步发现了“市场中只有看不见的手”。如果没有《道德情操论》,斯密就不可能走出人性贪婪的道德囚笼,更别提写出为后世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理论支撑的《富国论》。

就此,里德不忘幽默地说:“现在,利益的普世性使之堂而皇之地宣布,利益主宰着整个世界。”承认利益,就是回到人性本真。试问,有谁还愿意回到过去那个不敢直视利益的时代呢?

## 道德的“子午线”

普世仁爱的道德,很容易满足人们的良好想象。不过,在里德看来,这种无视空间距离的同

情,刻意淡化了人性本质,所谓的共情,更像是虚伪的道德表演。这也就是说,现实中那些喜欢对远离自己灾难施以同情的人,其之所以对身边不闻不问,权因这样的道德成本最低。

人们产生的同情大都来源于个人的设想。设想既因为五官感知,也取决于个人生活阅历深浅,究其根本,还是因为个人利益的相关性。同样的一个灾难,每个人产生的同情感受不可能千篇一律。里德并不认为欧洲人就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富同情心,除非这种道德标尺源自欧洲人的量身定制。但靠掌握话语权,就能代表更富有道德感吗?

就这一问题,卢梭的比喻既形象又贴切:一个国王不会同情他的臣仆,富人不会关心穷人,贵族不会关心农民。这并不是说前面这些人完全没有道德,只不过他们觉得后面这些人离自己所处的身份地位还很遥远,根本不可能危及自身利益。所谓的身设身处地,亦无法跳出各自利益的投影。

1755年的里斯本大地震在欧洲曾引发同情关注。伏尔泰认为,这是因为人们担心里斯本大地震“后尘”。即便是同情,斯密并不认为每个人都有,因为很多商人已经在暗地里寻觅其中的商机。众所周知,在里斯本大地震前后,世界其他地方都曾发生过比这次更大、死亡人数更多的地震,但都没有这次大地震给欧洲人造成的影响大。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距离。

道德距离其实不仅表现在地理意义上,还有国别、民族和文化等多种因素。里德相信,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道德观。在这里,里德引用了帕斯卡尔的观点——“正义的或不正义的东西都在随着气候的变化而改变

其性质。纬度高三度就颠倒一切法律,一条子午线就决定真理。”

哲学本身是对常识的积累与提炼,卢梭的比喻与常识为伴,很容易将普世仁爱道德论击得粉碎。卢梭将道德一分为二,认为道德分为情感逻辑和行动逻辑。他还庆幸,“情感逻辑与行动逻辑的不一致,才有使这个社会变得太过恐怖”。如果情感真的可以杀人,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多少人能够健康地幸存下来,我们经常听到一些人要打要杀的,并不是他们真的会这么做,绝大多数时候只是一次情绪的宣泄罢了。

## 还原“自然人”

还原“自然人”,就有必要看清哪些属于人性本真,哪些属于被强加的。越是人性的东西,越接近于人类的共同属性。“自然人”的道德是以自身为圆点,距离越远,道德越弱。这种从自身出发的道德,派生出道德的多样性。正是因为这样的多样性,人类才可凝聚更多前进的力量。

卢梭指出,“关怀与同情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才容易奏效。”这并非对人性约束,而是对“自然人”人性的尊重。也只有懂得如何做一个自然人,才能获得幸福”。

相反,那些反复用道德说教的人,往往企图通过道德建立权威,达到令他人屈服的目的。历史上的所谓普世仁爱道德,有多少是帝王将相夹带的私货呢?再者,尊重“自然人”的伟大意义还在于,当我们走在欧洲大陆的土壤上时,不用担心自己不是欧洲人,而被强加所谓的普世仁爱道德。

# 书中日月长

毕亮

去年的阅读中,大半天用在了重读孙犁著作上,尤其再次系统地重翻了一遍“耕堂劫后十种”。很长一段时间里,沉浸在孙犁的文字气氛中不愿走出来,后来写了一组《黄卷青灯》才作罢。

临近春节,心思变得烦乱,而看书的状态不佳,体重却在飙升。家里有去年买的十几本碑帖,就翻出来看看,看不懂碑帖,纯属瞎翻,翻时还常走神。释读不出其中的字,便当画看,看其美术价值,其实我也是不懂画的。我是在消磨打发时间。

找书吧。找书的过程,真是个体生活。当你想看某书时,找来找去,翻箱倒柜,就是遍寻不得,待你找到,读的欲望已损耗了大半。倒是找的过程中,偶然会发现从买回来就没看的书,真是被你忽略得太久了。赶紧拿出来摆在书架的显眼处,以便提醒自己常翻一翻。这套

碑帖,从买回来就束之高阁,终于等到“有存在感”的一天。

古人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真对。在单位,空闲时间里我用来自重读《彷徨》,屋外大概是有太阳的吧,办公室内昏暗,因为灯亮得白,这种气氛是适合看鲁迅的。读周作人,常读得走神。《彷徨》里的小说,已经看了几篇,看文末尾注明的日期:《祝福》写于1924年2月7日,《在酒楼上》文后的日期是1924年2月16日,《幸福的家庭》写于两日后的1924年2月18日。这一年,鲁迅43岁。

鲁迅的这些单行本小册子是从旧书店一本本地淘回来的。次数多了,愣是配齐了一整套单行本《鲁迅全集》。其中十几本的原主人还是同一人,它们从兵团的七十三团流落到伊宁市,最终被我收进了书房。就这样,二十几本新书如

不一地立在书架上的鲁迅专柜。

前些年,伊宁市还有不少旧书摊旧书店,他们都隐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本地的几个书友也经常互通有无。旧书商们也都很敬业,能收到一大批好书,许多书还是从本地老作家家中流出来的,有书的扉页签名、印章为证。这些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出版的文学作品,我一旦遇到基本都不会放过,甚至还偶尔买到从上海图书馆流出来的书。这些书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后来不知怎么上的新疆,又到了伊犁,然后被我买到。看到他们,就能想起往日流连旧书店书摊的时光。

旧书流通真是一门学问。前几日看陈晓维的《金性尧旧藏知堂译著入藏记》,记录他收藏从金性尧处流落出的周作人译著签名本的经过:“这本书是何

时,又是以何种方式从金性尧的书房流落到遥远的山西运城的。它中间行过多少里路,经过多少废墟。它揉一揉过度磨擦的膝盖,现在又向北京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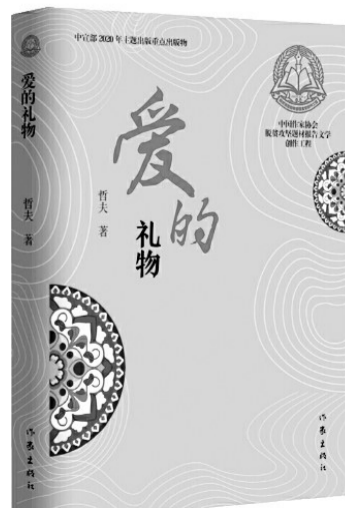
后来,有好多次,我从旧书店买到从上海到伊犁边界的诗人顾丁昆的藏书,突然意识到,那些扉页上盖着“上海图书馆藏书”等印章的书,应该是上海知青带来的,那些从上海到伊犁来的年轻人,爱读书者不少,第一次到新疆,行囊里也许有书;之后数次回上海探亲回来,肯定也少不得会带书到伊犁。多年后,他们中的许多人有机会重回上海,书成了搬家的负重,散书也是自然的事。几年前,顾老师也已经去世于上海;如今,他看过的书、写过的书,还在许多人的书架上。

书比人长寿。同样,书中日月,也长。

# 脱贫故事里的山西样本

曲宏

**提示** 脱贫攻坚的写作,以往多从“个案”“方法论”等视角来思考。哲夫的《爱的礼物》则超越了这种惯常视角,他站在全球语境下,以生态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高度,密切联结几十个人物的脱贫故事,来正视这一系统工程艰巨性、独创性。哲夫的书写,不仅让我们理解这一壮举,也让我们从中体会出独有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约束与解放**

哲夫在这部报告文学里高频使用“解放”一词,视角也没有惯常的思维“约束”,他把脱贫攻坚放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全球化语境中来书写。从日心说、星云说到崑崙城墙的包砖,从西汉戚夫人春米到漫山遍野红黄黄的沙棘,从崑崙的地表结构到整村搬迁政策,从驻村“第一书记”到脱贫农户……字里行间蕴含了对人类命运的哲学思考。正像哲夫所说的那样,人类是一个整体,中国脱贫攻坚不仅仅是送给本国贫困人口的一个爱的礼物,也是送给全世界人类的一个和平稳定的爱的礼物。

带着哲学思考,哲夫把脱贫攻坚放在更广博的范围来审视,相关的历史文化,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信手拈来。脱贫攻坚解放了那些被泥土囚禁的精神和血肉。书中的崑崙在烧炭山脚下,地处晋西北黄土高原中部,是忻州市历史悠久的县,这里山多沟深。古有欧阳修撰写的《修崑崙县志》,讲述了崑崙的古城建制和崑崙县境的长城旧址,把崑崙形容为一个醉卧汉子,颇有番接近天然淳朴的原趣。崑崙古城的性格就是崑崙人的性格,作者让一条文化的脉络穿行在叙述的

长卷里。崑崙的地理水土描写,使崑崙始终坚持的生态扶贫道路顺理成章,从而把历史文化与脱贫攻坚紧密地连成一片。

**镜头张力与古风古韵**

脱贫攻坚的报道很多,不少都会不约而同地逐渐趋向同一个模式——经验总结。本书却抓住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中国情怀,集新闻性、故事性、文学性于一体,同时调动了各种文学表现手法,如古诗词、小说描写、散文笔法、蒙太奇手法等,将内容既鲜活又厚重。

在每一小节的开头部分,作者都采用了古体诗词导引,这些诗词对章节里的内容起到引领作用。这些诗词有的是五言律诗、七言律诗,有的是三言诗,更多的是词,采用的是新韵,如《满庭芳》《满江红》《定风波》《何满子》《江城子》等。作者诗词功底扎实,每每写到激情处,就吟咏出一首诗或一首词,平添古韵古风。

如何描摹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崑崙人不落窠臼?哲夫有自己的选择:他跳出事物之外,纵横驰骋,天南地北,天上地下,从秦汉唐宋到今天的脱贫攻坚,洒脱自在,在看似散漫的文字叙述中,始终不离脱贫攻坚的主旨。

作者有着敏锐的视觉捕捉

力,这可能与作家身份有关。文字呈现出的画面就像一个个电影镜头的切分与组合,虽是片段,但都是最鲜活而有趣的片段。写沙棘是一幅画:“几乎所有的山坡的红色或黄色的火苗在闪烁,那是挂了果的带刺的沙棘。”有颜色,有动感,有层次,就像视频慢放一样;写忻州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志东暗访崑崙古城施工质量时,就用电视台一位朋友的讲述勾勒出一个意境独特的片段:半夜三更,一辆车驶来,停下,下来一人,小车绝尘而去。此人包得严严实实,按亮手电上了城墙。走走停停,东摸摸,西摸摸……该书中这样的镜头很多。投向这片土地和人民的目光,为我们映射出的正是崑崙人脱贫奋进的现实,也是中国许许多多人踏实前行的缩影。

## 细微与开合

有一次哲夫采访竟在深沟里迷了路,满沟呼喊,却不见人影。这段小插曲看似随意,其实很有深意。通过第一人称的切入,我们可知书中描写的众多人物都是带着泥土气息的,没有拔高的虚夸成分。哲夫善于几笔就描摹出人物性格,尤其善于抓住细节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这增进了文本的可

读、可视性。

同样写农村妇女,黄土坡村村民刘玉英吃苦耐劳,黝黑的脸上被冻伤,笑容柔和,手不大但粗糙有力。她勤劳肯干,早晨4点磨豆腐,7点匆匆吃口饭带上干粮出门,晚上12点睡觉。搬迁村朱家湾村村民田贵莲干净利落,身材苗条,面容姣好,屋里陈设一尘不染,还开了个小卖部,给工程队做饭。其他如养牛老板马牧生精明过人,除了给两个放牧人开工资,还隔三岔五送吃喝。黄土坡村驻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队长刘俊斌话少实诚,细高清瘦,村民使唤刘俊斌比使唤自己的儿女还直气壮,印身份证、给大娘担水、给大爷劈点柴……这些人物就像我们的邻居或远方的亲戚,展露出鲜活的具象。

这些人身上,都有一个共性的东西,就是有一股子气、一股子劲儿。他们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以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展示了脱贫攻坚的强大力量。正像忻州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志东对此书所评价的那样:“有开有合,开在人类,合在使命与价值。”

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些人,那么脱贫攻坚对全人类的意义就显而易见:与其沉迷在可能的困难中裹足不前,倒不如像这些人一样勇敢前行。

## ■ 书

# 珍惜每一段时光

张瑜

《万般滋味,都是生活》

《我们仨》

《人生的智慧》

生活滋味的体悟因人而异,普通人只会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但在丰子恺眼中,生活里的粥饭、草木和山水都有着不凡的滋味。

早前曾浏览过丰子恺的几幅漫画,对其超然物外、童心未泯性情稍有所了解,而翻阅《万般滋味,都是生活》后,感触更深,成功被他描画和书写生活的视角与见解圈粉。

《万般滋味,都是生活》收录了丰子恺40篇经典散文、40余幅全彩漫画,反映了他在人生不同阶段的思考与体悟。在书中,他描画白鹅和猫咪、追忆亲人和师友、品味生活与艺术,从箪食瓢饮、孩童玩耍、四时更替、艺术创作中感悟生活,率性自然、风格清新、意味隽永。特别是丰子恺对孩子日常状态的描写,爱意满满、真切朴实,不仅能感受到他作为慈父的一面,更能看出他对孩童般纯真心性的珍视。

丰子恺是现代画家、文学家、美术和音乐教育家、翻译家,他的文字温润纯净,一字一句洞察人间百态;他的漫画妙趣横生,简单几笔便能勾勒出生活情味。读他的佳作,我总能在会心一笑后,感受到乐此不疲去生活的力量。

我们每天都会做梦,有美梦有噩梦。虽然人人都期盼美梦成真、远离噩梦,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却独辟蹊径,选择以一场找不到钱钟书的梦魇开始叙事,刚一翻阅就引起我的好奇,究竟怎样的人与事,能让“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如此魂牵梦绕?细读才知这本书的沉重与厚重。

《我们仨》是杨绛的一本散文体回忆录。在书中,她多用梦的形式展开回忆,不仅记述了自己与挚爱的丈夫钱钟书和女儿钱瑛的生活往事,包括与钱钟书相爱、结婚、留学以及女儿出生后的家常琐事、悲欢离合,还用喜鹊一家自比,生发出“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的感慨。

心理学家认为,情感到了极致,无论悲喜都会幻以为梦。杨绛借用梦的形式表达抒发情感,足见对丈夫和女儿的至深感情。

《我们仨》这本书是杨绛在92岁高龄时记述结成,当时钱钟书与女儿已离开她4年之久。她通过营造梦境的遥远逃离,书写了丈夫和女儿相继离去的过程,不仅分化死别的悲情,也让自己的伤痛得以克制地宣泄。面对人生至痛的表达,杨绛的文字简洁深刻,文笔哀而不伤。她把自己的血泪挑破示人,却把爱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的心里。

还记得网络热词“打工仔”吗?它虽为黑色幽默,却道出我们奋斗和追求幸福的一种状态。幸福似乎触手可及,幸福又似乎遥不可及,究竟怎样过一生才是幸福的人生呢?

如果你一时难以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去叔本华的《人生的智慧》里找找“参考答案”,因为这本书又名“如何才能幸福度过一生”。

叔本华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唯意志主义和现代悲观主义创始人,《人生的智慧》是叔本华晚年作品《附录和补遗》中的一部分,也是他的成名作。在书中,叔本华暂时撇开唯意志论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他从世俗生活的角度探讨了人生应遵循的原则,论述了人生中怎样看待诸如健康、财富、名声、荣誉、待人接物、自身修养等问题,呈现了对幸福人生与如何获得幸福的阐释。

虽然对于“幸福论”的探讨一直是哲学书籍的永恒命题,但相较其他书籍,这本书更接地气,因为书中论述的问题几乎囊括了我们人生面临的所有问题,并且语言简明直接,观点独到深刻。他用近乎冷血的视角和表达,直抵世界和生命的本质,读来让人深有醍醐灌顶之感。

